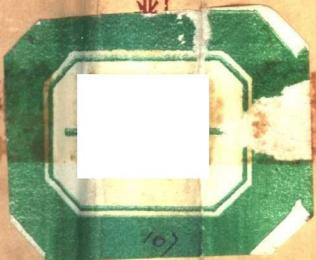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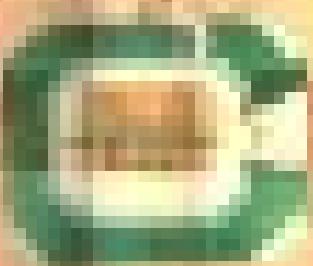


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



新編五經圖說

卷之三



敦煌的光彩

——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

責任編輯 李安
裝幀設計 洪清淇

書名 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
著者 [日]池田大作 [中]常書鴻
編譯者 高屹 張同道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

一九九四年一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大三十二開(140×203mm)111六面

ISBN 962•04•1143•9

©199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池田大作先生與常書鴻先生對談(1988年4月·聖教新聞社)



池田大作先生與常書鴻先生對談(1990年6月·東京)



常書鴻先生送贈池田大作
先生《雪之莫高窟》油畫
(1985年秋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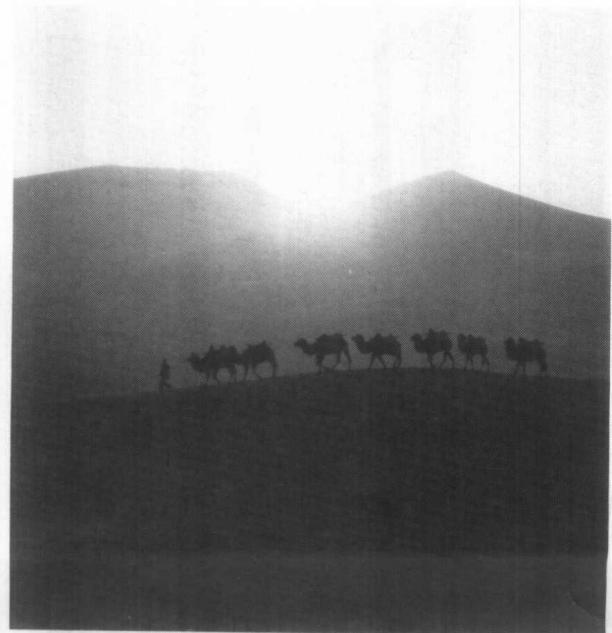
一般市民參觀“中國敦煌展”的風貌 (1985年11月 · 東京富士美術館)



常書鴻先生所贈《珠穆朗瑪峯》名畫揭幕 (1992年4月 · 創價大學)



敦煌石窟的近貌



絲綢之路

序　言

我曾到過敦煌兩次。第一次訪問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次讓我開始了解到「敦煌學」的淵博。香港創價學會李剛壽先生邀我為《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的這本書寫序，不揣謬陋，輒弁數言，綴於卷首。

「敦煌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其貢獻是多方面的，如中亞歷史、地理、語言、種族、社會、經濟、宗教、文學、藝術等（注）。因此「敦煌學」一天比一天受到國內外學人的重視。莫高窟的創建始於苻秦建元二年（三六六年）；經過十四個世紀的開鑿，直至清初。在這長久的歲月中，壁畫、塑像、建築等風格的改變，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更添增了敦煌藝術的風采。藏經洞也就是敦煌石室，其中所藏，以寫本卷子為主。其次是木版印刷本和石刻拓本；佛教畫則有絹本、紙本和繡本。除大部分為佛經外，尚有儒道經典、文件、諸子、史籍、韻書、小說等。經卷

上的文字，有漢文、西藏文、梵文、于闐文、突厥文等。寫本卷子中，有許多和現存印本不同的古書，不僅異常珍貴而且為數頗多（注）。

本書原著為日文，記錄了池田大作先生和常書鴻先生關於敦煌的對談，涉及範圍廣泛，如敦煌名稱的由來，法華經的由來，美學、敦煌壁畫對日本和歐洲畫家的影響等等。本書的第五章「萬代友好的紐帶」更是值得一讀再讀。池田先生對佛學、美學、文學的造詣與常先生對「敦煌學」的權威性，兩位的對話，特別具有意義。



（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一九九三年八月於香港

注：蘇瑩輝著《敦煌學概要》，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二及二十五頁。

前　　言（一）

池田大作

一九七四年我初次訪問中國。這次旅行是在綠色乍動的五月底至六月中旬兩周多的時間裏進行的。

我看到了蜿蜒曲折的長江，也目睹了雄偉壯闊的黃河；我登過萬里長城，也參觀了新中國的工廠、農村；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設施。通過同以李先念副總理（當時）為首的各界領導和青年、百姓的交談，我學到了不少東西。青年時代我就愛讀的中國史書、詩集與現實生活一起映入我的眼簾，這兩者之間的重合與距離給我帶來精神上的躍動，令我身心受益。

用照片去認識一件事物，常常為它同預想之間的差距而驚訝，同時也為新的發現而驚喜。完全憑自己的想像形成的認識輪廓同真實的事物相比，反差之大令人驚嘆！

例如，如果讓《三國志》和司馬遷《史記》的年代再一次在歷史舞台上出現，使遙遠的歲月

重演，當時英雄們同平民百姓的生活情景就會更加鮮明。

這樣的樂趣誰都會在旅行中得到，然而，這次中國之行給我的喜悅竟會如此之大。我想這或許是因為，在我的讀書體驗中，中國的古典詩集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在這次旅行中，西安——古都長安之行思緒最為強烈。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從遙遠的地方傳到這裏；遠達羅馬的宏偉的絲綢之路正是從這裏開始。

在去西安十三年以前，我到過印度。看到了恆河，也拜訪過佛教發祥地佛陀伽耶。那時，從佛陀伽耶出發，歷經西域、敦煌、長安和朝鮮半島最後到達日本的、遙遠宏大的「精神絲綢之路」彷彿展現在眼前。星換月移，我又來到西安，極目遠望，《唐詩選》中吟咏西域的名詩一字一句浮現在眼前。

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坐落在敦煌以西，周圍是一眼望不盡的沙漠。站在空曠的沙漠中，一個人也不認識。王維的這句詩準確地表達了當時的心情。玉門西望堪斷腸——這是岑參在西去長安萬餘里的玉門關上發出的悲苦的絕唱。這些都帶着一種現實感，使我對西域、敦煌的心理距離一下縮小了許多。

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先生（當時），我的心理距離進一步縮小。初次訪問六年後，我在第五次訪問時才見到他。當時（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在北京期間，常先生和夫人李承仙女士特地到我的房間來拜訪我。

我從未想到能遇見常先生。是每次訪問時都給我照顧的孫平化先生（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向我介紹，我們才得以愉快地相見，在春日溫煦的陽光下開始我們的長談。

常先生的人生是詩，是藝術。在他的人生中有着光輝的歷史和迷人的傳奇故事。

我們圍繞絲綢之路和敦煌談了將近三個半小時，我真恨不得再多談一會兒。原先我對敦煌的知識不太了解，就連「敦」是「大」，「煌」是「閃光」的意思也是在那次交談中學到的。自從與常書鴻先生的那次交談後，我對敦煌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了。以後在東京見面時，正值我創立的東京富士美術館的「中國敦煌展」開幕，常先生給予了多方關照。

我曾把對常書鴻先生感謝的情思寫成詩獻給他，回憶他的成長道路，祝願他與歲月一道發出五彩的光芒。

在這樣的交流中，以敦煌為主題的話集正在準備刊行。我不揣淺陋，在國家、民族、文化、

社會制度及個人等各個領域，超越了專業的界限，與這些創造了偉大業績的、現代最高智慧的代表者進行對談。到現在，交談對象不知不覺中擴展到美國、蘇聯、英國、法國、西德和意大利等國家。^{*}與中國活躍在第二線的人物進行對談，這是最初的嘗試。

從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到個人的日常生活，進一步到個人的深層意識，種種「人為的分裂」威脅着和平。在這人間悲劇相繼發生的現代社會裏，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選擇一條安定與調和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負有重大的責任。

正如絲綢之路上的敦煌文物和藝術一樣，超越遙遠的歲月，成為現代人的珍貴遺產，我想讓我們為和平付出的努力在下一代人，在將來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們身上，看到二十世紀戰爭與分裂不再重現的福音。我想，每一個與我交談的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 池田大作曾與世界上很多有影響的人進行對話，其中有《展望二十一世紀》（與湯因比對話）、《黑夜盼望黎明》（與曾內·烏依古對話）、《二十一世紀的警鐘》（與A·貝恰對話）、《第三條虹桥》（與莫斯科大學校長A·A·羅吉諾夫對話）、《談『和平』、『人生』、『哲學』》（與日·基辛格對話）等。

在通往新世紀的「精神絲綢之路」上，我祈禱美麗的藝術之花大放光彩，像敦煌那樣的和平基地在各地誕生。

最後，再次感謝「精神絲綢之路」的嚮導、給我們留下愉快回憶的常書鴻先生和幫助常先生工作至今的各位先生，感謝聖教新聞社的編輯大原照久君、野崎至亮君和翻譯洲崎周一君。

一九九〇年五月於日本東京

前　言（二）

常書鴻

我與池田大作先生初次會見是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三日。那次見面，池田大作先生對中國的了解以及在哲學、文化藝術等方面學識之廣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先生對中國文化以及對敦煌學的熱情，使我們首次見面時就好似多年好友一般，「一見如故」，開懷暢談起來了。

池田大作先生作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曾多次訪問過中國，池田大作先生和他所致力的社會、宗教文化和國際和平活動，在中國也是眾所周知的。特別是早在一九六八年，池田大作先生就提出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建議，是令我們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在心的。

回想起我與池田大作先生多年的友情，是我一生中的又一快事，在我所相識的許多日本友人

中，池田大作先生雖然已年過六旬，但他為人熱情、耿直，對生活和對人類未來充滿信心的感情，使我感覺到他還是一位年輕人。

自從我們相識後的近十年間，不論是池田大作先生來中國，還是我去日本，我們的相見和談話的話題總是要涉及到人類文化、絲綢之路和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藏——敦煌。我們之所以在談話中經常談到敦煌，我想，這是因為敦煌不僅僅是佛教遺址，而且敦煌藝術體現了人類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在當時充滿着饑荒和戰亂的年代裏，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經濟的交流和佛教的東傳，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和和平，起着極其重大的作用。而我們今天對絲綢之路的重視和研究，喚起我們精神上新的絲綢之路。這在目前經濟和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同時，存在着對地球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國際政治的不穩定時代裏，新的絲綢之路對促進人類平等，消除戰亂，走向永久和平，有着新的積極意義。

我與池田大作先生雖然在國籍、個人經歷等許多方面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却有著相類似的艱苦生活和努力奮鬥的過程，所以，我十分理解池田大作先生所熱心倡導的青年和平友好事業。一九八五年秋日，我在日本琦玉縣的青年和平文化節上所看到池